

书话漫谈

王阳明的心学及其现代价值(上)

张立文

一、宋明理学 理心气学

宋明理学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和哲学思想的“造极”期，是儒释道三教融突和合的精华。唐以来就希望把中国的儒释道融合起来，当时提出一个文化整合的方法，叫作“兼容并蓄”。但是唐代的200多年到宋代前60多年，并没有真正把儒释道三教融合起来而构建出一个新的哲学理论体系。为什么？因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，发生安史之乱，到五代十国的时候，中国原有的伦理道德被破坏了，人们的价值理想也丧失了。精神没有了寄托，灵魂成了孤魂野鬼，没有一个落实的地方。

到了宋明理学，怎样化解当时伦理道德的衰和价值理想的丧失？怎样把儒释道三教融合起来？怎样落实“兼容并蓄”的方法？方法受价值理想的支配，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。当时，程颢提出：“吾学虽有所受，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。”可以查一下，《庄子》和

《礼记》中就有“天理”两个字。那么为什么程颢讲“天理”两个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？乃是他自己把“天理”升华为形而上本体论的理论思维。他把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实到了“天理”上，构建了一个理学的理论思维体系。从这点可以看出，一种方法需要落实到一个实在的层面。不同时期，不同人的价值观不一样，因此，程颢对天理的体会和理解与过去也不一样，进而他能够将“天理”两个字构建出一个思想逻辑体系。

宋代实行偃文政策，对当时的学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当时学术多元、学派林立、大师辈出，出现了哲学理论辉煌的新时代。当时北宋有周敦颐的濂学、张载的关学、二程的洛学、王安石的洛学、司马光的涑学以及苏东坡父子的蜀学。到了南宋，出现了朱熹的理学派、陆九渊的心学派、张栻的湖湘学派、叶适的事功学派、吕祖谦的金华学派。这时演讲与学术讨论非常盛行。比如朱熹和陆九渊有“鹅湖之会”。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展开了争论，两派的思想很不一样。陆九渊批评朱熹“支离事业”。这个“理”在哪里？你一物一物地格、一书一书地格，就成为支离。陆九渊说自己是“易简工夫终久大”。可见当时学术讨论的氛围很浓厚。

什么是“理学”？“宋明理学”是什么？这需要搞清楚。有人讲宋明理学是个浊流，是污泥浊水的一个时期。我们对宋明理学必须有个理性的认识。可以肯定地讲，宋明理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。从汉到唐，奉行注疏之学，死守“师法”“家法”。对于经典，若汉代的人做了注解，那么唐代就不能再做了，只能做注的注，叫做疏，“疏不破注”。我们知道，古人认为五经都是圣人之言，是神圣不可改的，只能按照圣人讲的话来说。但宋人为什么能够思想解放呢？他们认为五经不一定是圣人之言。譬如说《诗经》，有很多是恋爱的诗；《尚书》，是政府颁发的告示；《周易》有的不是圣人之言；《春秋》是“断烂朝报”。这样就把原来人们思想中不可动摇的“五经”，像五座大山一样，把它们推翻了。在这种思想风气下，朱熹以“六经注我”的方法，通过做注解，发挥自己理体学的思想，不仅自己做注解，而且自己来补经。譬如说《大学》当中的“格物致知”没有解释，朱熹就自己补上了解释，体现了一种思想的开放。

从宋到明的学术思想，我们叫宋明理学。其实宋明理学不仅到明为止，甚至到了近代，近代的新儒家也是继承宋明理学而来的。宋明理学从主流来说，基本分成三派：一派是二程到朱熹的理体学派，一派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体学派，一派是张载到王夫之的气体学派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按朱熹的话，即使天地都陷了、没了，这个“理”还存在，所以他是“理”作为最高哲学概念的。陆九渊讲，这个“理”不是在外面，而在“心”中，所以“心”就是“理”，开启了心体学派，由王阳明所继承。从张载到王夫之，“气”是最高范畴。王夫之认为，“理”就是“气”的条理。三派对“理”有不同的认识，其关注的问题在于：“理”是客观的，是在心外的，还是在心里的，还是说是“气”的一种解释？对于这些问题，三派互相探讨，互相批评，互相切磋。

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、著名哲学家)

艺苑 笔谈

讲好黄河故事

李骏虎

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：“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。”2021年10月的济南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的伟大号召。2021年10月12日，我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，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国家战略。

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，一路流经9个省区入渤海，孕育出河源文化、河湟文化、河套文化、三秦文化、三晋文化、河洛文化、齐鲁文化，共同构成绚烂的黄河文化谱系，这个文化谱系应该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本遵循，而不同省份的建设任务也应该因文化特质的不同而异。

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中流域，得到20世纪以来重大考古发现佐证，发掘成果印证了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典籍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中流域繁衍兴盛的记述。地处黄土高原的今山西地区，由于土

层丰厚而水患较少，则文明历史更为久远，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就有近400处，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157处，居全国之首。华夏先民所创造的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陶寺遗址，位于今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，经测定，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，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形态遗存。考古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、王墓，恢宏的宫殿，独立的仓储，官办的手工业区，还有世界最早的观象台，因此许多专家学者据此提出，陶寺遗址就是帝尧的都城，是当时华夏部落联盟的中心、国中之国——最早的“中国”。这一发现对华夏文明在黄河中流域文化的发源、国家形态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山西河津的龙门是黄河晋陕大峡谷的南出口，传说大禹治水13年，光开凿此龙门就用了4年时间，如今两岸的峭壁上当年凿凿的刻痕依然清晰可见。三晋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“表里山河”，山西之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，多

与这个人文地理特征相关。正是山西表里山河的有利地势，使得元末明初席卷华夏大地的战争没有波及。明代山西洪洞大移民，对于中华复兴、民族融合的伟大贡献永载史册，其舍家为国、筚路蓝缕、艰苦创业的伟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影响深远。

山西境内黄河沿岸有古渡口42处，留下很多人文遗迹和传说故事，黄河长城“二龙戏珠”的老牛湾、诞生唐代五言诗压卷之作的鹳雀楼、留下千古爱情传奇的普救寺、沉淀中华文化智慧的黄河大铁牛、彰显中华美德传说的五老峰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壶口瀑布、西口风情浓郁的碛口古镇、红军东征的革命遗迹、八路军总部的旧址，汾河入黄口的湿地公园、乾坤湾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……星罗棋布，展现黄河沿岸人民生活风情的各种文学、影视和舞台作品更是经典迭出。

自2021年以来，我连续参加了山西省政协召开的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”专题常委会会议、省政协文史委组织的“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”专家座谈会，2022年8月又随山西省政协调研组，赴忻州的偏关县和河曲县，开展了“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理念，助力沿黄精品景点建设”专题调研。深感山西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、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富集，立足资源优势，可以说，黄河文明孕育出的三晋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，既是华夏文明的源头，又呈现了完整的脉络和发展体系，堪称“华夏文明博物馆”。基于此，我认为在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总体规划布局中，应在山西段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沿线合理选址建设“华夏文明博物馆”，展示中华文明的源流和伟大。同时组建专门的黄河文化研究机构，整合力量，培养专家研究团队，以深度挖掘山西黄河流域文化资源，讲好黄河故事。此外，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，将华夏文明博物馆数字化，增强华夏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。此举既能够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，有利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，同时可以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，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，彰显中华文明在全人类文明中的历史地位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山西省作协主席)

梨树院 随笔

常沙娜《黄沙与蓝天》

杨建平



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好买书，不懂收藏。搬家多，丢的书也多。唯有作者签名题赠我的书，一本不少的一直珍藏。近来翻检重读，犹如风雪故人，万千思绪，飘然而起，袅袅如轻烟笼罩。不由得拿起画笔，试着为自己喜欢的珍藏书，手绘藏书票，并记下自己的阅读感受，以附骥尾，攀附风雅。

我的家乡三门峡，1957年开工修建“万里黄河第一坝”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。那时库区淹没区的移民地点就是敦煌。

我最早知道敦煌，是移民，是黄沙漫漫，背井离乡。根本不知道有莫高窟。

1978年考上大学后，我的老师叶鹏讲美学课，讲到敦煌，讲到莫高窟，讲到飞天，还讲到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个人贡献和悲欢离合。

我对敦煌的认识由“黄沙漫漫”变为“艺术圣殿”，心向往之。

对那个伴随父亲常书鸿坚守敦煌的小女儿，充满好奇和牵挂。

课下，曾经追问叶老师：常书鸿那个

女儿后来干什么？在哪里？叶老师说：我也不知道。

30多年后，叶鹏老师的女儿回答了我这个问题：她是中央工艺美院毕业，她知道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就是他们的老院长。

由叶老师女儿的帮助，我得到了常沙娜先生签名给我的回忆录《黄沙与蓝天》。那份惦念，有了着落。

80多年的人生经历，在常先生的笔下娓娓道来，儿时在法国的天真烂漫，回国途中的颠沛流离，敦煌的艰苦磨炼，美国的打工学习……犹如一幕幕画卷在读者眼前展开。尤其是1945年家庭变故后，14岁的她坚守敦煌，独自料理家务、养育弟弟，坚持到莫高窟临摹壁画，打下扎实美术功底。在

艰难困苦中的坚韧、豁达、成熟，读之令人落泪。

在美国留学，闻讯新中国成立，她毅然中断学业，踏上回国的旅途。

从美国回来后，在清华大学跟随梁思成、林徽因做助教，并从此转行专门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和教育。

在那火红的年代，常先生曾经参与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的图案设计，其中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图案就是她的手笔，民族文化宫大门的装饰图案也是她的作品，北京展览馆电影厅的拱顶装饰、首都剧场大厅天顶石膏花纹等都有她的参与和贡献。

常先生一生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和教育，曾经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5年，作品无数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满天下。

香港特区紫荆广场的金紫荆雕塑，是常先生最后主持的设计作品。她说，这是中央工艺美院为国家作出的最好贡献，也是我15年中央工艺美院院长任职的最后努力，无愧人生了！

生在法国，长在敦煌，学在美国，工作在新中国，成名于新时代。常先生一生传奇，故事多多，书中的许多故事、许多细节，闻所未闻，书中许多图片、许多插图，首次披露，弥足珍贵。

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、品味的好书，常先生是值得敬仰、学习的先辈！

(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)



梨树院

文心 画趣

“意笔精微”是我多年来在中国画创作中的追求。“精微”一词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。”君子恭奉德性、学思致知，于广大处和精微处体会道之显现，以中庸的方式表达道之高明。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体现了儒家既尊奉道体之大，又穷尽道体之细，既从广大处着眼，又从精微处入手，从而于平实中达到高明的中庸智慧。“精微”和“广大”的深层意义表达的是一种境界的追求，在追求宽广博大的知识境界的同时，又能够深入到细微之处，达到极致的高明。另外，《中庸》还谈到“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”，它不仅是做人的大道理，也是作画之道，《中庸》思想启发了我的绘画创作。

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首先启发了我作画的观察方法，观物时，我理解的“广大”是大局观，“精微”是组成大局的细节。中国画的笔墨表达，要在“广大”和“精微”之间寻找一种恰到好处，同时具有辩证关系的表达方式，也就是大处着眼、小处入手。

作大画，面对丈二或者丈七、丈八的纸绢，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局观。具体来说，我会先用大写的笔法给整个画面定型，然后从小处着手进行描绘和刻画，形成一种既“仰望碧空”，又“稳扎稳打”的效果。这里的“仰望碧空”是指把整个画面看作浩瀚宇宙，天地之宽，“稳扎稳打”即小处着手，观察入微、刻画精致，使“广大”与“精微”，二者辩证统一，而不偏废。

在传统绘画中，我们看到的是粗犷的大写意笔法和工笔的结合，但是二者之间又是相对独立的，也就是说“广大”和“精微”是独立分开而又合一的。而我笔下更强调的是把“广大”和“精微”融为一体。

我理解的“意笔”有多重意涵。首先是意境之美，是对意境的追求。我的绘画创作希望通过客观的主题、客观的物象，表达主观的意向，也就是超越具象之有限，借物托言、物我两忘，“神与物游”“思与境偕”，这是中国画追求的意境，也是书法笔意的演变。谈到“意笔”，我们会想到写意，以及写意精神的表达。中国画历来强调书画同源，提倡书、画用笔同法。我作画时，极力强调“以书入画”，以书法中的提案顿挫、疾徐、骨法、粗细浓淡、刚柔等，呈现中国书法的笔意精神和中国画的审美特征，将“锥画沙”“屋漏痕”等笔法运用到绘画中，使“广大”更显“精微”，“精微”更具“广大”。

“意笔精微”是笔法、是境界，还有一层意涵是“古意”。中国历代画家皆崇古、摹古，但“古意”显然不是简单在技法上因循古人，要达到“意与古会”，重要的是修养和审美

「意笔精微」的阐释与思考

刘万鸣

上的提升，因此在创作时，我所谓的“意笔精微”也包含着重视作品对“古意”的再营造与再表达。

对于“意笔精微”的思考，不仅是我个人的认识，也是当代艺术家对中国画的一种诠释。

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)



文心画趣



▲陶寺遗址“观象台”